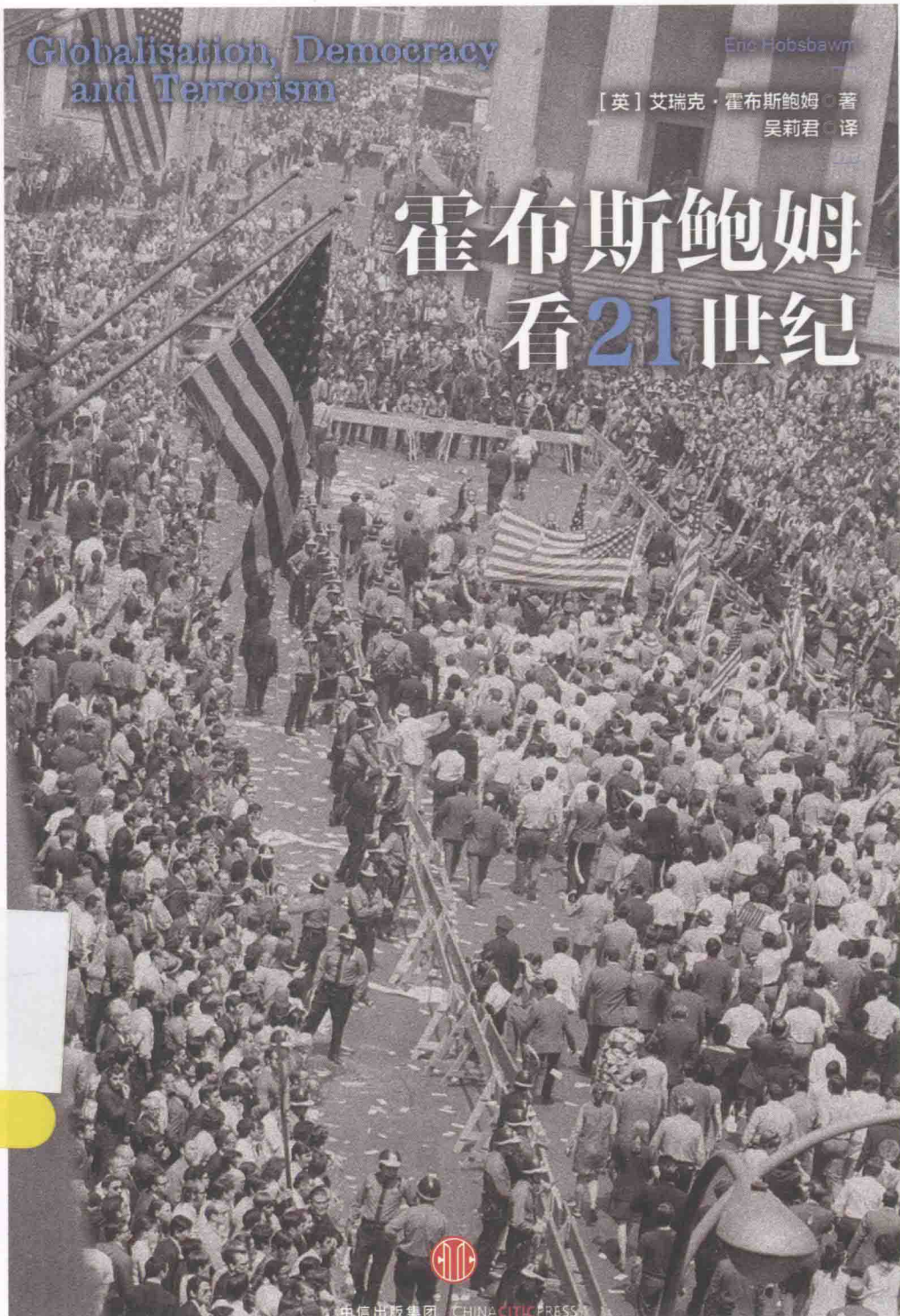


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Eric Hobsbawm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吴莉君 译

霍布斯鲍姆 看21世纪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CITIC PRESS

Eric Hobsbawm

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霍布斯鲍姆
看21世纪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
吴莉君◎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霍布斯鲍姆看 21 世纪 / (英) 霍布斯鲍姆著 ; 吴莉君译 . — 2 版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5.8
书名原文 : 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ISBN 978-7-5086-5027-2

I. 霍… II. ①霍… ②吴… III. 国际政治-21 世纪-文集 IV. D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5408 号

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by Eric Hobsbawm
Original copyright © Eric Hobsbawm, 200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5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霍布斯鲍姆看 21 世纪

著 者 : [英] 艾瑞克 · 霍布斯鲍姆

译 者 : 吴莉君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北京画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5.5 字 数 : 100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09-1477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5027-2/D · 283

定 价 : 3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序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一个时代，因为它结合了前所未有的人类大灾难以及丰盈富足的物质进步，而我们改变或者说摧毁这个星球的能力，也在与日俱增，不知究竟到了何种地步——甚至已延伸到这个星球之外。我们该如何回顾这个“极端的年代”，或说，我们该如何前瞻从这个极端旧时代中孕生出来的新纪元？收录在这本书中的文章，是一位站在第三个千禧年开端的历史学家，试图去考察、分析和理解这个世界的状况，以及今日我们所面对的主要政治课题。这些文章同时也是对我先前某些作品的增补和更新，特别是我的“短 20 世纪史”《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我与波利托 (Antonio Polito) 的对谈《新世纪》(*The New Century*)，以及《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这样的尝试是必要的。历史学家能为这项工作贡献什么呢？他们的主要功能，除了记住其他人已经忘记或想要忘记的事情之外，就是尽可能从当代的纪录中后退，以更宽广的脉络且更长远的视野去观看与理解。

在这本以政治议题为主的文集中，我选择将焦点放在五个今日特别需要我们去厘清思考的领域：一、“战争与和平”这个大问题的 21 世纪的发展；二、世界帝国的过去与未来；三、民族主义的

本质和变化脉络；四、自由民主的前景；五、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上演这五大问题的世界场景，由两项紧密相关的发展所主导：一是人类借由科技和经济活动来改变地球的能力变得无比巨大且持续加速；二是全球化。不幸的是，这两大发展中的第一项，到目前为止并未对政治决策者造成重大冲击。各国政府的施政目标，依旧是尽可能地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全球变暖的危机，政府并未提出任何实际有效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全球化——也就是把世界当成互联活动的单一单位，不受地域界限的阻碍——对政治和文化造成深远冲击，尤其是在当前这种不受控制的全球性自由市场的主导形势之下。本书收录的文章并未特别讨论全球化的课题，主要是因为人类的各种活动中，政治是实际上较未受到全球化影响的领域之一。瑞士经济研究院（KOF）曾对全球化做了一些有点儿含糊的量化工作，在该机构出版的全球化索引中（2007 年），很容易找到与经济和信息流动、个人接触或文化传播相关的词条——例如，麦当劳和宜家家居的平均数量——但是在“政治全球化”这方面，除了一个国家的大使馆数量、参与国际组织的会员资格，以及参与联合国安理会任务的次数之外，该机构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统计指标。

有关全球化的通盘讨论或许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有三项与全球化有关的整体观察，却和本书的论题紧密扣连。

首先，当前蔚为时尚的自由市场全球化，在国内和国际之间造成非常严重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而且没有迹象显示，虽然极贫的状况一般已有改善，这种两极化的情形不会在国家内部持续下去。这种快速蹿升的不平等现象，已经变成这个新世纪社会和政治紧张的主要根源，特别是碰到经济极端不稳定的时候，例如全球自由市场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所导致的那些现象。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已经对国际间的不平等造成压力，不仅威胁到北方旧世界人民相对惊人的生活标准，对诸如印度和中国这类人口庞大、实际上绝无可能达到任何类似标准的国家亦然；只要这样的压力存在一天，就会产生它自身带来的国内性和国际性紧张。

其次，对全球化冲击感受最强烈的，是那些从中获益最少的人。因此，可以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中得到庇荫的一方——可以把成本“外包”（out-source）给劳动力廉价国家的企业家，可以在任何高收入市场经济中取得工作的高科技专业人士和高等教育毕业生——与无法得到好处的一方，对于全球化的看法就越来越两极化。正因如此，对老牌“发达国家”大多数靠薪水和工资维生的人

而言，21 世纪初带给他们的，若称不上是灾难性的前景，至少也是个棘手的未来。全球化自由市场已经侵蚀了政府和福利体系保护他们生活方式的能力。在全球经济中，他们必须与境外的男女竞争，那些人和他们拥有同样的资格，却只要他们薪水袋的一小角就可以雇用；在国内，他们所面对的全球化压力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储备大军”，而这支大军指的是来自全球广大贫困乡村的移民。诸如这样的情势，当然不可能许诺一个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时代。

再次，尽管全球化的真实发展态势还算温和——也许除了几个大体说来面积较小的国家，主要在欧洲——但它激起的政治和文化冲击却大到不成比例。因此，在西方大多数的发达经济体中，移民都是最主要的政治问题，虽然居住在第一世界的非本国出生人口，实际上并未超过 3%。在 2007 年瑞士经济研究院所做的经济全球化排名中，美国居第 39 位，德国第 40 位，中国第 55 位，巴西第 60 位，韩国第 62 位，日本第 67 位，印度第 105 位，不过上述国家除巴西外，其他在“社会全球化”的排名中都略高（英国是唯一一个在经济全球化和 社会全球化排名中都位居前十名的主要经济体）*。也许这

* 这项排名乃根据 2004 年的数据。

是一种历史性的短暂现象，也许不是，但无论如何，短期之内，这种不成比例的冲击，仍然会对国内和国际性政治带来严重后果。我预测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内，政治抵抗——未必是恢复正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会以某种方式减缓自由市场全球化的速度。

我希望，书中讨论战争、霸权、帝国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现状，以及公共暴力与恐怖主义等篇章，无须进一步说明，读者就能领略理解。我同样希望那两篇讨论民主的文章也能如此，因为我意识到，试图点出西方通俗政治论述中最神圣的“母牛”之一——其实并不如众人想象的那般“丰乳多汁”，是一项极富争议性的做法。在今日的西方政治论述中，有关民主的种种论点——特别是把某些神奇的特质归派给由多数选民在几个敌对政党中选举出来的政府——比起任何言论或政治概念，都更是无聊且无谓的废话。在最近的美式修辞学中，“民主”一词已经完全脱离现实。我的这两篇文章想通过理性和常识来冷却这股热潮，希望能对这项必要的工作做出小小贡献，虽然如此，我仍坚定支持为人民——所有人民，无论富者或穷者，贤者或愚者，通晓者或无知者——服务的政府，以及得到人民参与和同意的政府。

收录在本书中的文章都做过必要的修订与更新，它们最初大多

今日，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就会以极其残忍的野蛮手段去追逐自己的目的，这就是 20 世纪留给我们的遗产。对于那些把伟大的人类目标当成核心价值的人而言，他们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可以是某种特殊的联盟或对立，绝不会是永久的认同。即便有非常罕见的、真心追求传播其普世使命的新兴革命国家——例如 1792 年后的法国、1917 年后的苏（俄），但不包括乔治·华盛顿时代实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也总是寿命不长。任何国家的预设立场，都是追求自身的利益。

除此之外，支持以武力干预他国事务的人道主义，是建立在以下三种假设之上：一、当代世界可能发生不可容忍的情况，通常是大屠杀甚至是种族灭绝；二、没有其他可能的解决方式；三、这样做的好处明显超过其代价。这三项假设在某些时候都有其正当性，但是，如同有关伊拉克和伊朗的辩论所显示的，究竟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称之为“不可容忍的情况”，几乎很难取得普世同意的答案。也许下面这两个案例大家可以取得一致的共识，认为干预是正当的：一是越南入侵柬埔寨，终结了令人发指的波尔布特政权的

“杀戮战场”（1978年）*；二是坦桑尼亚摧毁了阿明在乌干达的恐怖政权（1979年）**。（当然，并非所有快速而成功的外国军事干预，都能在当地的危机情势中产生如此令人满意的结果——比较令人质疑的案例包括利比亚和东帝汶。）两者皆是由短暂入侵所达成，并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和某种持续性的改善，但两者都无意废止已经确立的国际外交原则，亦即不干预主权国家的内政事务。附带一提，这两项干预事件都不具有帝国主义的含义，也和更广泛的世界政治无关。事实上，美国还是继续支持被罢黜的波尔布特。这样的特殊干预事件，和可以容忍由美国建立世界霸权，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 波尔布特（Pol Pot）为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1975年取得政权后，以残暴手段进行统治，造成100多万人死于非命。波尔布特在外交上采取与越南敌对的政策，导致越南与反波尔布特的游击队结合，派兵于1978年越过边界，1979年初攻占首都金边，并扶植亲越的红色高棉分子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1984年的电影《杀戮战场》（*The Killing Fields*），就是描述红色高棉统治下的可怕屠戮。——译者注

** 阿明（Idi Amin）为乌干达的军事独裁者，1971年取得政权后，恣意进行政治压迫、种族驱离和非法屠杀；据估计，在其统治期间的死亡人数约有50万人，并导致大量难民逃至邻国坦桑尼亚。阿明除了在境内以残酷手段对付异议分子，1978年还试图并吞坦桑尼亚的一省，导致坦桑尼亚发动与乌干达的战争，并于1979年推翻阿明政权；阿明本人逃往利比亚，2003年死于沙特阿拉伯。——译者注

而且，这也不是近年来军事干预的做法，近年来的干预都是有选择性的，干预者绝对不会去碰触就人道主义标准而言最恶劣的残暴个案，像中非洲的种族灭绝。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巴尔干事件中，人道主义的关怀当然是一项重要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以波斯尼亚的情况来说，外界的干预或许有助于提早结束当地的血腥杀戮（虽然反对派始终不以为然），比起让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彼此残杀到最后要好得多，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地区直到今天依然动荡不安。至于 1999 年的科索沃事件（一支由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所组成的极端主义少数团体，在科索沃发动叛乱并对抗塞尔维亚人所引发的流血冲突），我们不禁要问：武力干预真的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吗？而塞尔维亚人最后之所以放弃强硬不妥协的态度，究竟是因为外国的武力威胁奏效，还是因为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成功？对于这两个问题，答案并不清楚。这个案例的人道主义基础比波斯尼亚的情况更令人质疑，除了战争本身和长达数月对塞尔维亚执行毁灭性轰炸所造成的平民伤亡之外，还因此激怒了塞尔维亚人大规模驱逐境内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结果似乎是使人道主义的情况更加恶化，而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关系也未能因此稳定下来。不过，最起码，巴尔干的军事干预相当快速，

也发挥了短期的决定性效果，尽管到目前为止，也许除了克罗地亚人之外，没有人有理由对结果感到满意。

另一方面，美国从2001年开始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虽然因为美国推翻了几个声名狼藉的政权而在人道主义的舆论上具有某种正当性，然而其背后根本不具备任何人道主义的考虑。若不是因为“9·11”事件，即便是美国，也不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情况不可忍受到必须立刻发动侵略战争。阿富汗战争被其他国家以老派的“现实主义”理由加以接受，伊拉克战争则几乎遭到普遍谴责。虽然美国很快就推翻了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但这两场战争都未取得胜利，而其目的当然也绝非对外宣称的建立西方价值的民主政权，以作为该区其他尚未民主化之社会的明灯。这两场战争，尤其是惨绝人寰的伊拉克战争，不但牵延甚广、死伤惨重、血腥遍地，甚至直到笔者写作本书的此刻，仍看不出任何结束的征兆。

在上述所有的案例中，武装干预都来自外国，同时夹带着优势无比的军事权力和资源。到目前为止，其中没有任何一次干预产生过稳定的解决方案。在所有相关国家中，外国的军事占领和政治监管依然持续。最好的情况是——当然不会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武装干预终止了血腥战争并带来了某种和平，但并未产生令人满意的

积极结果，就像巴尔干半岛的案例所显示的。最糟的则是让局势变得比之前更加恶劣，例如伊拉克，我想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当地人民的处境已糟到无以复加，解放他们只不过是冠冕堂皇的战争借口。在近来以军事力量干预外国事务的纪录中，即便干预者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没有任何一次是成功的。

失败的原因，部分和下列假设有关，这项假设也是支撑人权帝国主义的一股重要力量，那就是：野蛮和暴虐的政权对于内部变革具有免疫力，因此只能依靠外部力量将之终结，然后干预者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或法律机制移植进去。这项假设是承袭自冷战批评者抨击“极权主义”的那段时日。但既然苏联已经瓦解，这类假设就不该存在了，又或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我们看到亚洲和南美许多声名狼藉的集权和军事独裁政权，相继出现了明显的内部民主化过程，证明这类假设已经无法成立。这类假设也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亦即军事行动可以立时带来重大的文化转变。但事实并非如此。价值和机制的扩散，很少是由突然性的外来压力所造成，除非当地早已存在可以接受这些价值机制或可以接受它们引入的条件。民主、西方价值和人权，并不像某些科技输入品，例如和平的自行车和屠戮的 AK-47 步枪，或诸如机场之类的技术服务，

其作用立竿见影，而且只要负担得起又懂得怎么使用的人，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采用。如果真可如此，那么全都生活在（理论上）类似的民主架构之下的欧洲、亚洲和非洲无数国家之间的政治相似性，就应该更高才对。简言之，历史很少有快捷方式——这是笔者学到的一课，很多是来自活过上个世纪的经验，以及对它所做的深刻反省。

最后，感谢以下单位提供本书论文首次发表的机会。第一章是根据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周年研讨会（奥斯陆，2001年）的论文修订而成；第二章是应《印度书评》（*Indian Review of Books*）之邀，在德里查·克拉瓦特纪念讲座（Nikhil Chakravarty Memorial Lecture）发表的演说；第三章是2005年哈佛大学梅西讲座（Massey Lecture）的内容；第四章是2004年在希腊萨塞洛尼基大学接受荣誉学位时发表的就任演说；第五章是2004年为德文版《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al and Nationalism*, Campus Verlag, Frankfurt）所写的新版序；第六章最初是2000年于诗人会社讲座（Athenaeum Lecture）发表的演说；第七章是收录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的一篇文章，主题为：“世界最危险的想法”（2004年9/10月）；第八章是比较久远的作品，为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纽

约哥伦比亚大学针对恐怖行动所发表的研讨论文；第九章是 2006 年在伯贝克学院发表的公开演讲，属于“暴力”系列演讲的一部分；第十章是 2003 年为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 所写的专文。我同时也要感谢不厌其烦听我讲述并与我讨论的同僚，尤其是那些身在新德里、哈佛和纽约的朋友。身为一名专业作家，我也要感谢我的意大利出版者；他们首次提议可以出一本论文集，把这些主题一贯的文章收录成一本小书；也要感谢亨特 (Bruce Hunter) 和科利斯 (Ania Corless) ，他俩说服了我和其他出版者将此想法付诸实践。

另一方面，由于书中收录的文章主要是在不同场合发表的演说，对于其中不可避免的重复，我应在此致歉。我删除了某些重复之处，但若全部删除，势必会伤害到每篇文章各自的连贯性，只好请读者原谅。但或许这些重复之处可让本书形成一种整体感，或许也可以让某些篇章里过于浓缩的论述比较容易理解。此外，轻微程度的重复说明，也是笔者终身未能戒除的好为人师的习惯之一，期望借由不断阐释而发挥说服的功能。希望我不致太过啰嗦才好。

目 录

序	I
第 1 章 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001
第 2 章 21 世纪初的战争、和平与霸权	017
第 3 章 为何美利坚霸权不同于大英帝国	035
第 4 章 论帝国终结	061
第 5 章 新世纪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071
第 6 章 民主的前景	083
第 7 章 传播民主	103
第 8 章 恐怖行动	109
第 9 章 暴力时代的公共秩序	129
第 10 章 不断扩张的帝国	145

第一章

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 本文根据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周年研讨会（奥斯陆，2001 年）的论文修订而成。